

## 壹、前 言

從大學的發展歷史來看，1950年代之前，高等教育一直停留在菁英階段，在大多數國家，高等教育的參與率皆只有個位數，因此與社會互動的層面並不廣泛。由於與外在環境保有相當的距離，大學數個世紀以來一直享有相當的自主（戴曉霞，2002）。但是，這種情形到了各國之高等教育突破Trow（1973）所稱的「菁英型」（elite）模式（同年齡層青年升入高等教育的就學率未達15%），進入「大眾型」（mass）（就學率超過15~50%之間）或「普及型」（universal）（就學率超過50%）階段以後，就有了明顯的轉變。對大學體系內部而言，高等教育的擴張首先帶來原有菁英大學在規模上的成長，以及其他非大學部門（non-university sector）高等教育機構的設立。「量」的擴張及體系結構的改變，也逐漸導致高等教育「質」的轉變。除了學生的特質（包括性別、家庭背景、學業成績等）與菁英階段不同之外，高等教育的課程也產生明顯的變革。不但原本被認為學術性較不濃厚而被排除在大學門外的領域紛紛成立新科系，大學原本的課程也被認為必須適度地反映學生的能力、興趣及生涯規劃（戴曉霞，2002）。

尤其，在全球資本主義浪潮中，由於經濟活動扮演了決定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角色，在大多數工業國家，要求「高等教育回應經濟需求」已經積極轉化為高等教育政策。誠然，高等教育與經濟活動應該保持何種關係或許是一個見仁見智、沒有定論的議題，但是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的關係，在各國高等教育快速擴充，進入大眾化階段之後，就有了本質上的轉變。對於大學體系的外部環境而言，高等教育的擴張也影響了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各面向的發展。首先，大批的大學畢業生取代了勞動市場中學歷較低的勞力，不但提升了勞工的水準，也加速了經濟的發展與轉型，特別是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其次，高等教育的普及也帶動了社會對各種文化產品與繼續教育

的需求。此外，教育水準的提升也促進了社會大眾對政治的期望，要求各種法案與政策能符合自身的利益。簡言之，高等教育的擴張不僅提高了人們做為經濟勞動力與社會公民的素質，同時也促進了社會整體的發展，使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顯（戴曉霞，2002）。

1950年代以來，台灣的高等教育已有長足的進步，在1950學年度僅有大專校院7所（大學1所、獨立學院3所、專科學校3所）及大學附設之研究所3所，學生為6665人；1980年代以後，我國高等教育呈現快速成長，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從1981學年度到2010學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由104所迅速增為163所；惟其中多由專科學校升格改制而成，且2010學年度公立學校僅占33%（54所），私立學校則占67%（109所）。在學生人數變化方面，1981學年度時大專校院學生總人數僅為358437人，至2010學年度已擴充為1343603人，增加將近4倍。1981學年度我國專科學生為192901人，大學部學生158181人，碩士班研究生6555人，博士班研究生800人；再與2010學年度大專校院1343603人相比，其中除專科學生人數下降外，大學部學生增為1021636人（增加約6.5倍），碩士班研究生為185000人（增加約28.2倍），博士班研究生為34178人（增加42.7倍）（教育部統計處，2011a），由此可見，我國在這30年高等教育快速擴張的過程中，以研究生人數增幅最大，遠高於大學部學生人數增幅，專科生人數則因學校升格改制而下降。整體來說，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邁向「大眾型」或「普及型」模式發展，高等教育發展有下述主要特徵：大學生所占的比重快速增加、研究所成長的比率大於大學部；專科改制技術學院、技術學院改名科技大學之校數增多，以及私立大專校院在培育人才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吃重，在大學及專科階段，不論是校數或學生數均可說是以私立校院為主要的供給者，私校之重要性不言可喻。

不過，前述高等教育大幅擴充的結果，雖使得高等教育機會得以普及，大學校院門戶大開，但不可否認地，它也同時引發了人們對大學教育品質下降的疑慮。這種對高等教育品質的憂慮，更因大學考試分發的錄取分數逐年降低而更形嚴重。本研究旨在對大學教育的數量